

1978

沈鴻

陸遜

孫武軍

沈音

王劍冰

李如

曹劍

李毅

王如林

李器

郭家

張品成

孫志

成世善

汪國英

谨以此书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致敬那个火热的年代

20世纪80年代
大学生诗歌运动访谈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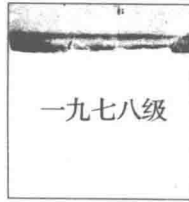
姜红伟 编著

JIANG HONGWEI WORKS



197xxx-198xxx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太原



青春的尾巴

与诗歌的潮头

——北京广播学院叶延滨访谈录

问：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答：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有人说那时的诗歌还没有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有许多诗歌还与社会与政治靠得近，技术上还没纯熟等等，其实，这一切都不是否定“黄金时代”的理由。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开放最快，进步最大，民主化进程最显著的十年，这个时期的大学生主流的状态是“以先天下为己任”关心国家与民族了，追求民主与进步，是学生的主流，因此，这十年，诗歌全面地发展，不仅现代主义，还是归来者与民间写作等，黄金十年，可作为指标的几条：诗人和写作者最多，在社会产生影响的作品最多，读者和爱好者最多，刊物品种与发行量最高等，在这四个最多

最高后面是大学生写诗读诗和社团最多。

问：您是哪年考上大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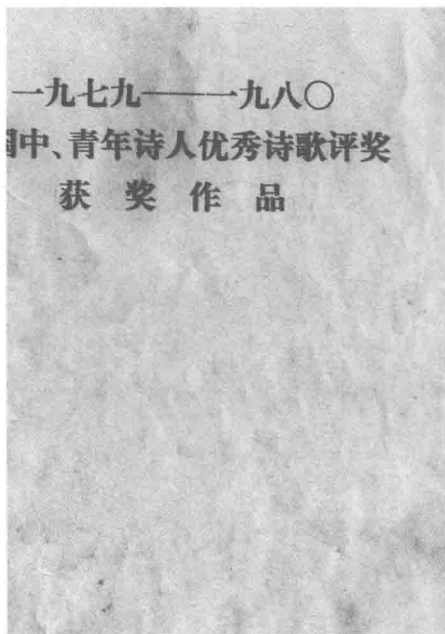
答：那是1978年夏天的事。1978年，对于我来说，是个人命运中充满矛盾的时期。此前，我在陕西延安插队，在军马场当农工、仓库

保管员，后来又在秦岭大山里的化肥厂当团委书记，“文化革命”结束后调回四川，虽然还是个工人编制，但在地委宣传部里当新闻报导员，刚被送到省委党校学习，没能参加第一次高考。眼看1978年的高考又要开始了，而我却每天的工作排得满满的，没有一点复习迎考的时间。请假复习，肯定不会准假，再不参加高考，又不甘心！

那天，我骑着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午休后去机关上班。自行车刚穿出巷口，就听得从头上传来一声恐怖而绝望的尖叫。我一抬头，前方一个男人，正从小巷道旁一棵高高的白杨树上，锯下一根侧枝的树干，树干在他的尖叫声中，已经从天而降。我本能地猛地捏紧自行车的双闸。

我眼前一黑，被弹到空中。

我睁开眼，我被自己吓住了，树干从我的鼻梁刮过，满鼻



收入叶延滨获奖诗作《干妈》的《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诗歌评奖获奖作品》

子是血，眼镜不在了。树干从我的手臂刮过，手臂和手背都是血。树干从我的小腿刮过，腿上也是血。我被抛到车前一丈多远，浑身是血躺在路上，回头看，那辆飞鸽车，三角大架被砸成V字，两个车轮还没倒，站立在树干两侧！

救护车把我拉进了医院，经过检查，骨头和内脏都完好无损，碗口粗的树干，齐刷刷地刮掉我一层皮，从鼻梁到两只手臂再到两条腿。大夫说：玄！你的自行车再向前一厘米，这一切都不需要了。

这个悲剧很快被当成了正剧甚至喜剧来欢庆。我在这事件以前，曾想报考大学，领导以工作需要为由，没批准。这回在家养病一躺就是两个月，正好抽空补习迎考。怎么补？我读书时，数理化学得好，但快三十的人了，学理工学不出什么了！考文科，躺在床上，借来一叠课本读。最重要的是，在床头贴了三张大图：一张中国地图，一张世界地图，再加一张中国历史年表。“地理一大片，历史一条线”。等到我能下地走路了，也就进考场了。真是靠地理和历史得了高分，我成了我们地区文科第一名，被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文艺编辑专业录取。

问：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革命生涯”。

答：我因为创作第一个高峰及成名时期是我上大学时期，所以，你和一些入把我归于大学生诗歌参与者，其实，我虽然在这个时期上大学并写诗，但多是独行侠式的活动，与运动无多大关系，我1982年毕业，毕业后在《星星》工作，所以更多的时间是关注大学生诗歌运动。

我是20世纪“文化大革命”前老三届的高中生，在我读高中的时候，一心想当科学家，1965年暑假，从四川独自一

人坐绿皮火车到北京，看望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姐姐，一心就想考上清华。“文化大革命”粉碎了我的梦，被打到生活的最底层。底层生活让我学会了养活自己的技能，同时也让我有了证明自己的愿望。在“文化大革命”中，街道发给我一百六十元安家费，派出所注销了我的城市户口，毛主席给了我一个新身份“知识青年”，我就和上千万的年轻人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在延安的窑洞里，我学会了忍受饥饿、学会了劳作受苦。我在延安农村当了四年知青，在农村我的第一个职务是生产队副队长和知青组长。后来又在延安富县的军马场当仓库保管员和陕南略阳的2837工程处当团委书记和新闻干事。1973年2月，收到《延河》（当时叫《陕西文艺》）的邀请，到西安参加“诗歌创作会”，到会的二十多个作者中，我是唯一还没有发表过作品的“诗人”。同年3月我在《解放军文艺》和《陕西文艺》同月分别发表一首小诗，算是开始了我的文学创作生涯。当年夏天，我被借调到《陕西文艺》当工农兵编辑，大概有半年时间，在东木头市老《延河》的小院里，认识了杜鹏程、魏钢焰、王丕祥等前辈，也初识了在小院里出入的陈忠实、贾平凹、路遥……更难忘的是，在编辑部工作期间，以“进行大批判需要资料”为由，从图书室里借出了大量的中外诗歌名著，这是我第一次集中阅读中外诗歌的经历，上百部诗集，有传统经典，有外国名著，还有当时借内部批判黄皮的苏联当代诗人作品集。所以，我的创作生涯的起点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延河》（当时叫《陕西文艺》）。1978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文编专业，1980年在校期间发表诗作《干妈》获中国作家协会（1979—1980年）诗歌奖，读大学期间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问：当年，您创作的那首《干妈》曾经很受读者喜欢，能否谈谈这首诗的创作、发表过程？

答：谢谢你愿意提我三十多年前这篇成名作，当时能轰动，是因为当时有几千万人当过知青，大学里坐满了从农村回到课堂的知青。我写的是我自己真实的故事细节，也是这几千万知青自己的情感，轰动也就可以理解了。今天人们还总提起这篇诗作，是因为有一代人不会忘记的这段历史。除了共同的命运以外，我认为，我在诗中不仅写了知青的命运还说了老百姓的愿望：“……人民好比土地、啊，请百倍爱护我们的土地吧——、如果大地贫瘠得像沙漠，像戈壁、任何种子都将失去发芽的生命力！”三十多年前说出这样的话的，也许只有诗人！

问：能谈谈您大学期间的“诗生活”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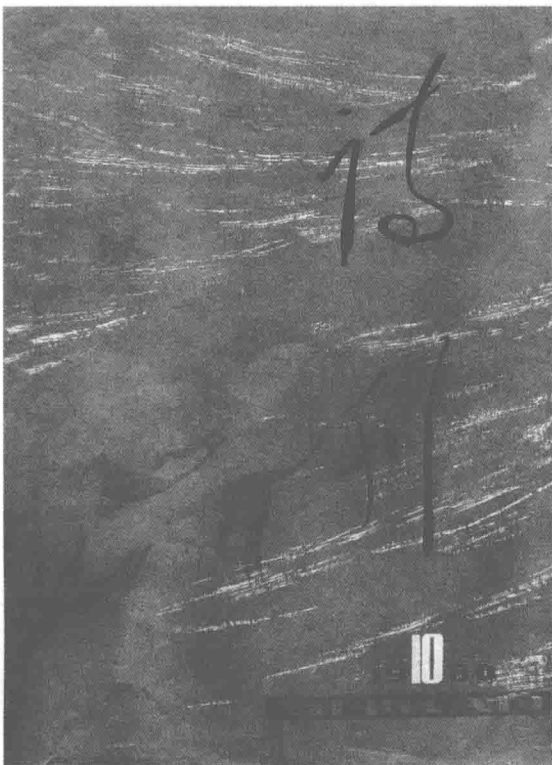
答：我一进大学，几乎全校都知道我是个“诗人”。这事还要从高考说起。

那年的高考我在各门考试里，语文考得最差，六十多分。当年的作文题是将一篇文章删节到六百字，我一看这题目，高兴坏了。当了多年的新闻报导员，天天干的就是这活。几分钟勾勾画画，完了，也没数，凭经验差不多。交了卷。成绩公布后，才考了六十几分，不服气，要求查卷，查卷的结果是，作文题扣了十几分。我才知道，省招生办请了一个学校的学生来数这六百字，规定多一个字，扣一分。我那篇比六百字多了十几个字，冤不冤！这哪是考语文，这是考算术嘛。心里不服，心里也打鼓，语文压低了，录取老师也许就会不要了？当年还有个规定，“有特长的可以优先”，急不择路，我把我在报刊上发表的几十首诗歌订成一本，作为“特长”交给了招生办公室。这下子好了，当我走进广播学院的时候，都知道这一届有个写诗的学生了。

系主任杨田春在迎新讲话的时候说：“我们是新闻系，我们培养记者、培养编辑、我们不培养诗人，也不培养作家。”系主任是想明确指出专业方向，但这句话让所有的同学把目光丢在我脸上。我想：“谁是诗人了？你才是呢！”

我们这个班，我是党支部书记，班长上学前当过乡干部，团支书是部队里的连级“四个兜”，全班有一半同学的年龄都比刚从大学毕业的班主任岁数大。记得我为她写的一首《比我小五岁的班主任》发表后，在学校引起了小小的轰动。这首诗不长，快三十年了，它记录下的历史还会让人感动吗？她，腼腆而文静 / 比我小五岁的班主任 / 满脸胡茬的我喊她：“老师！” / 她竟低下头，害羞地蹭着鞋跟 / 她，实在是太年轻 / 和我翘鼻子的小妹一样的年龄 / 啊，妹妹遇到头疼的事情，还只会朝妈妈撅起嘴唇 / 她却甚至要领导“妈妈学生”—— / 第一次点名“贾英” / “请假了，她孩子得了病……” / 哄笑声差点掀翻水泥屋顶 / ——还是姑娘的班主任啊 / 该笑？该恼？还是该脸红？ / 啊，80年代初的中国大学 / 有这样的老师，这样的学生—— / 颠倒了年龄和身份 / 弄乱了经历和学问 // 课堂上她面对这样的学生—— / 客气的，手心捏着单词本 / 淘气的，画着老师的发型 / 因为她虽有大学的文凭，——却是“文化大革命”的“工农兵”。 / 泪水，打湿了讲稿：《现代作家和诗人艾青》 / 不，老师，我该理解你，同代人啊同样的命运 // 你每月四十元工资 / 我是二十元助学金 / 但面对我们贫困的祖国 / 你瘦削的肩上担着双重的责任 / 啊，贫困，我们贫困的民族 / 有一个贫困熬出来的传统—— / 当多病而羸弱的母亲 / 再也不能为孩子弯下腰身 / 她未出嫁的女儿啊 / 就撑持起一个苦斗的家庭 / ——送哥哥出征！ / ——抚弟弟成人！ // 为战胜所有的贫困我们在苦斗啊 / 老师，你比我多五年的资本—— / 五年？一个总理可以制定一个复兴的

首发叶延滨诗
作《干妈》的《诗刊》
青春诗会专号



计划 / 五年！你将证明你是具有民族之魂的女性。这首诗发表后，首先是我的班主任激动地向我表达了她“想不到”的感动，后来在老师中传看，再后来，我陆续发表了《729——我的学生证号》《带月票的大学生》《北京，我的二平方米》等表现大学生生活的诗歌，我在学校里也就被公认是个诗人了。现在中国传媒大学的校歌《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就是在我在校期间为合唱团写的校园组歌中的一首。

在这段时期，我开始在《诗刊》等杂志较多地发表诗歌，1980年9月号发表了呼吁改革的《十万个为什么》，之前的6月号头题发表了我直接写“文化大革命”题材的组诗《那时，

我还是个孩子》。这组诗歌发表后，严文井先生的夫人，时任《诗刊》作品组长的康志强大姐，给我写信说：“叶延滨，我们领导看了你最近在刊物上发的诗，想见见你，你抽空来一下吧。”这次见面，是第一次与著名的诗人谈话。与我谈话的领导，说话很直率：“你写诗有五六年了吧，我看这一两年你是开了点窍，怎么开窍的？说说看。”我也真没想过这个问题，也直率坦言：“没想过，我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那好吧，好好想想，想好了，再告诉我。”回到学校后不久，收到了《诗刊》寄来的通知，让我在暑假期间，参加《诗刊》举办的“青年诗作者创作学习会”，我心想：“没回答好领导的问题，有麻烦了。”

就这样，我怀着忐忑心情参加了这个“青年学习会”，这就是在当代诗坛影响深远的《诗刊》第一届“青春诗会”。

问：在大学期间，您参加过哪些诗歌活动啊？

答：大学期间最重要的诗歌活动，就是出席首届“青春诗会”。

“青年诗作者学习会”从1980年7月20日到8月21日就在《诗刊》举办，为了方便就说大家公认的说法“第一届青春诗会”吧。《诗刊》当年在虎坊路甲十五号，那时还是一个大院，没楼，都是平房。参加学习会的青年诗人多数就住在编辑部的院内，少数家就在北京的人还“走读”。小平房，木板床，八月暑天吱吱叫的夏蝉，都让人怀念。吃饭是在旁边的京剧团食堂搭伙，买饭票和剧团的人一起排队打饭。生活简单，同时也就像一个单位的人，领导、编辑和学员，共同生活了一个月，这是20世纪80年代最可喜也最典型的文学氛围。

十七个青年诗人中，我在到会前都知道他们的名字，但真正见过面的不多。梅绍静在延安插队，我认识她最早，1973年她写了一本叙事诗《兰珍子》，在西安开会认识她。当年我被

借到《陕西文艺》当“工农兵编辑”，领导就布置任务：“延滨，给梅绍静约稿，请她给我们写点诗。”让编辑部约稿的诗人，多大的面子啊。还认识顾城，是在《北京文学》，当时好像是诗歌组长姚欣找我改稿子，谈话间顾城到编辑部来送稿，听说是顾城，心想“这是个名人啊！”不过送稿的阵势，好像是家长送孩子上学，前面是父亲开道，后面是母亲提包，进来出去顾城自己没说一句话。我心里想：“这天才还是个孩子，没长大。”

其他的诗人，都是新朋友，徐国静、徐晓鹤、孙武军都是大学生，一混就熟了。大学生高伐林后来分配在北京工作时，向我通报，有人写了我的“内参”，救我于危难，至今不忘！吉林大学的徐敬亚和王小妮是一对恋人，幸福指数很高，后来他们结婚时，给我寄来一张糖纸，让我为此写了一首诗。我毕业实习时，采访王小妮的节目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广播节目报要登照片，王小妮的照片领导没通过，因为“留着长长的直发，也不梳起来，太出格了！”这个细节让我记忆深刻。

工人梁小斌是岁数较小的，总是做出沉思状，好像哲学家。顾城穿一双部队发的那种塑料凉鞋，不过，特意在后跟上粘了一层同样的塑胶鞋底，让我察觉到顾城骄傲后面的一丝孩子气。岁数较大的张学梦和杨牧脸上都蚀刻下了岁月的风雨。才树莲这个农村孩子比她的诗还朴实，而性格张扬的常荣一看就是个老北京人。陈所巨是从桐城来的诗人，重情分，多少年来，每年都给我寄茶叶“桐城小花”，可惜他已辞世，前两年他的文集出版，我专程到安徽参加他的文集发布会，他是青春诗会这棵树上的第一片落叶。江河和舒婷在青年诗坛名气不小，都是朦胧诗代表人物，青春诗会上还没有朦胧诗人这说法，江河给人印象很随和，让我愿意与他交谈。舒婷不一样，名字很淑女，说话很玫瑰，好听的话里总有刺。如果要舒婷回忆青春诗会，

她会说两条：一是“叶延滨欠我一杯咖啡”，二是“我在青春诗会上就说了，我们中间叶延滨会当诗刊主编”。

“青春诗会”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请文坛的著名作家诗人给“青年作者”讲课。不像今天能写几句诗就自称诗人甚至“著名”，与会的青年诗人有的当时名气已经很大了，但还是认真的界定为“青年作者”。讲课老师的阵容强大：艾青、臧克家、田间、贺敬之、张志民、李瑛为十七位年轻人讲授诗歌创作。黄永玉、冯牧、顾骧等为与会者报告当下的创作动态。袁可嘉、高莽向大家介绍了世界诗坛，蔡其矫透彻地分析了一批著名的外国诗歌。这些都是中国文坛重量级的人物，他们给十七位青年人讲课，交谈，对话，讨论，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文学界特别是诗歌界十分可喜的开放、宽容和民主的氛围。整整半个月的时间，名家与新人，文学界的领导与青年写作者，坐在一起，平等交流也不乏交锋，这种姿态和气氛，空前民主和空前开放。能坐到一起，也有坐到一起的道理。此时文坛的大家名流，多是刚“平反”重新回到久别的文坛，与会的青年诗作者同样来自生活的底层，大家都有共同的愿望，也对改革开放充满了热望与信心。其实，参加“青春诗会”我已经三十岁了，这应该是我告别青春的一次仪式，从此以后，我被诗坛所认可，并以青年诗人的身份在诗坛活动了十五年，直到1995年我调进《诗刊》任副主编，这是后话。在“青春诗会”的讨论中，我用了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表达我的创作思想：“在我们今天的时代和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坐标点，在纷繁复杂的感情世界里找到与人民的相通点，在源远流长的艺术长河中找到自己的探索点，三点决定一个平面，我的诗就放在这个平面上。”《诗刊》老编辑王燕生作为首届青春诗会“班主任”，生前回顾当年的青春诗会，还提起我的“三点决定一个平面”的这个发言。我以为，我对时代、读者和艺

术之间三点关系的理解，基本上决定了我一生的创作倾向。作为首届青春诗会的成果，1980年10月号《诗刊》以“青春诗会”为总栏目发表了十七位青年诗人的作品，同时，发表了艾青讲课的文章《与青年诗人谈诗》，冯牧在诗会上谈话的摘要文章《门外谈诗》。这一期成了十七位青年诗人的作品专号，刊物出版后引起了诗坛极大的轰动。我在这一期上发表的是《干妈》写的是我插队中与一位农村老大娘共同生活的感情经历，这首当时标为（叙事组诗）的作品，第二年获中国作家协会（1979—1980年）优秀诗歌奖。不久我又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这个时候我还没有出过一本书。应该说，发表这首诗之后，我被诗坛承认，从此在诗坛活动了三十多年时间，在《星星》诗刊工作了十二年，从编辑做到主编，在《诗刊》工作了十四年，从副主编、常务副主编做到主编。有幸在两个重要的诗歌刊物工作，为诗歌服务，这是诗歌给予我的光荣，也是我对诗歌的感恩回报。

问：在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人中，您是一位有名的“双枪将”，一手写诗歌，一手写歌词，而且你写的《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以下简称《白杨》）还被称作中国内地第一首校园歌曲，您能和我们谈谈这首歌词的创作情况吗？

答：我写的《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歌词，被称作内地第一首校园歌曲，那是这首歌在全国传唱多年之后，在乐坛兴起校园歌曲热之后乐坛的说法。之所以得到这样的“第一”，有以下几个原因：一、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中国大陆由在校大学生作词、在校学生演唱并在全国传唱的第一首歌；二、这首歌出场，是在首届北京合唱节上，作为“校园组歌”五首中的一首，在正式演出就引起轰动的歌曲，歌曲一出生，就明

确了其校园身份。三、这首歌在全国传唱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80年代新一辈”全国首届青年歌曲大赛中获奖。四、此歌产生全国影响后，被北京广播学院认定为校歌，并且中国传媒大学继续定为校歌。在中国以至世界上，由在校学生作词，由在校学生演唱，并成为一个名牌大学校歌的“校园歌曲”。以上四个“第一”大概有别于其他的校园歌曲。

综上所述，我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学生诗人，为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做出的“贡献”，或我自己可以说一下的成绩主要有四项：1. 发表了成名作《干妈》，并获中国作家协会的“全国优秀中青年诗人奖”；2. 参加首届“青春诗会”；3. 为中国传媒大学（当时叫北京广播学院）写了一首校歌至今传唱；4. 在大学期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问：你对当下的中国诗坛现状是什么看法，能概括地描述一下吗？

你对当下的大学生诗人们在创作上有什么建议？

答：处于中国文化与欧美文化交流的激流中，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处于全球化的开放时代，中国诗坛空前的丰富多样，（台湾地区由于暂与大陆分离，其诗歌发展有其独特性，我这里主要就中国大陆地区的诗歌进行分析），在这个多样杂芜的舞台上，认真梳理一下，大致有三种主要的流向，扮演着三种主要的文化角色：

第一，面对世界的向外姿态。这是中国大陆自20世纪末以来，发育了三十年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之一。

中国诗歌的复苏，缘于20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外开放让中国年轻的一代有机会接收到现代思潮，表现自我成为人性张扬的最有吸引力的口号，在**一批曾受到政治歧视和不公正待遇的著名诗人艾青、牛汉、蔡

其矫、穆旦、绿原等重返诗坛写作的同时，一批年轻的诗人在新诗潮的影响下，写人性写自我写性爱写意识流等等，给诗坛以冲击力，他们最早以自印的诗刊《今天》发表作品，北岛、舒婷、顾城、杨炼、芒克等年轻诗人围绕在刊物周围。同时，中国最有影响的《诗刊》在1980年举办了青年诗人改稿学习班，并以“青春诗会”的名义整本刊物发表了参加这次活动的十七个诗人的作品，造成空前轰动。参加青春诗会的部分诗人也在努力学习现代主义表现手法，这些人加入“青春诗会”表明现代主义得到主流诗坛的认可，同时也引起了传统理论家的强烈批评，同年《诗刊》8月号发表《令人气闷的朦胧》，从此中国有现代主义倾向的新诗潮被称为朦胧诗。朦胧诗这个称呼表明了这些诗歌在中国传统读者的眼中是一个形象模糊的角色，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外，中国传统诗歌美学和现代诗所借鉴的西方现代主义美学的差异，也产生了读者疏离诗歌的效应。然而，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对于中国诗坛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在不断地争论中发展。在理论姿态上明确向西方主流文学靠

叶延滨1982年
在艾青寓所与艾青
交谈

